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3.020

“祛魅”与“复魅”:论传统武术 网络媒介形象崩解

刘中望,李龙跃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马保国事件”消解了武术网络媒介形象,表现为荒诞式的话语呈现、断裂化的媒介记忆、消遣式的网民参与,主因是基于视觉媒介的武术欣赏结构变化、媒介奇观效应下的围观扩散、权威话语缺席下的情感消费。在武术与网络的交互关系中,媒介导致武术形象多维消解,集体参与加速武术形象崩解,武术符号形象与现实发展脱节。遏止武术网络形象崩解并重塑积极形象,需利用媒介搭建武术认同基础,推动武术形象正常化发展,多维度强化武术教育。

关键词:武术;网络媒介形象;祛魅;“马保国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153-09

近年来,负面武术网络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公众对中华传统武术极大的关注。传统武术经由影视剧作、小说、民间传说等的渲染,在国人心中被赋予某种神话想象色彩。然而,系列负面媒介事件使武术被祛魅,传统武术的媒介形象岌岌可危,几陷崩解境地。2020年5月传统武术“大师”马保国被轻易击倒事件,引起网络热烈讨论,单微博话题就有41个,阅读量最高达2.1亿次。中新网、北京青年报、成都商报、红网、潇湘晨报等专业媒体纷纷报道此事。“马保国事件”勾起人们对“气功大师”王林、“太极宗师”闫芳以及徐昌华、雷雷等人物的媒介记忆,成为系列事件的集中反映,促使政府对民间武术各类称号、比武活动等加以严格管控。在上述损害武术网络媒介形象事件的背后,具有大量共通的构成要素,比如,一个“著名的”武术大师,在网络上被广为传播且有被标签化的视频或言语,关涉太极、咏春等著名武术流派,喜剧化的比武或演示,受众的讥笑反应,等等。就重要性、代表性和复杂性而言,“马保国事件”是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典型个案,对其研究可探析传统武术形象崩解的一般规律。

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武术媒介形象反

差巨大。报纸上,武术是民族象征符号之一,是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电影和小说中,武术是经典题材和中国特有元素;在文艺表演中,武术是春晚演出的经典节目,北京奥运会的“千人太极”更是广受好评。在网络媒体中,经由“马保国们”的“表演”,武术成为令网民唾弃的对象,被降格和解构为“花拳绣腿”。本文基于媒介形象相关理论,聚焦“马保国事件”,探究网络媒介中传统武术形象崩解的表现与后果,分析网络媒介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推动作用,探索遏制措施和重塑路径。

一 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理论逻辑与话语构建

媒介形象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研究,必须建立在剖析学术肌理、分析理论关联的基础上。

(一) 媒介形象与武术网络媒介形象的内涵

约翰·费斯克指出:“‘形象’(Image)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或是想象的。现在一般指为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

收稿日期:2020-01-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A483);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改重点项目(JG2018A017);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150)

作者简介:刘中望(1980—),男,湖南新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左翼文论研究。

着其中具有一定的虚妄,以至现实难同其形象相符。”^①可见,“形象”生成暗含媒介生产机制,“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诉诸符号表达,符号离不开媒介载体,符号即媒介。“媒介形象”中“媒介”和“形象”并用,旨在更加突出传播语境及媒介属性对形象的影响,强调形象是媒介“中介化”后的对象物。本文将“媒介形象”定义为:某客体经由媒介符号以及赋予意义的特定事件和相关讯息,所传递的某种与真实区别的公众印象或个体认知。媒介形象具有明显的评价性,暗含个体态度及汇聚的公众评价。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定义为:在网络环境中,经多元主体对武术符号、人物和事件的传播和评价,在网络空间和大众心中形成的关于武术的个体认知和公众印象。媒介形象有积极消极、正面负面之分。积极正面的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包括:认知上,强调武术是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进一步发扬;情感上,为武术感到自豪,相信它仍具重要价值;行动上,捍卫武术正面形象,抨击轻视和抹黑武术的行为。

(二) 武术网络媒介形象的理论要素与话语逻辑

媒介形象涉及客观现实、媒介拟态、认知评价三个核心点。媒介形象的理论先导是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论、间接关联“符号互动”论^②。媒介形象是现实的符号化和中介化。

一方面,媒介形象(Mediated Image)的“Mediated”定义了“‘形象’本身乃是作为‘介质’存在的”,意味着“媒介形象横亘在人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间,构成对于生活世界的遮蔽”^③。人们将事物、社会和自然把握为形象来理解和认识世界,世界被形象中介化。类似于居伊·德波所指出的,景观重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 worldview”^④。也就是说,景观脱离现实的世界,与形象存在某种同义性。鲍德里亚进一步衍生出“拟像”“仿真”概念,其“拟像四阶段说”的最后阶段即形象生产的自

我闭环,完全脱离现实。媒介奇观理论继续拓展“Media Spectacles”,强化人在媒介形象生成时的主动参与,不仅是现实虚拟和扭曲反映,而是有意制造更夸张和引人注目的“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⑤,此即凯尔纳“Media Spectacles”译为媒介“奇观”的原因。景观、奇观、拟像与媒介形象的共通性在于,都是媒介“非客观的反映”,彼此共通,其区别只在于,前三者更多是对符号脱离现实高维度的社会批判和现象剖析,而媒介形象是低维度的微观研究,旨在探析媒介形象与公众印象的互动关系。运用高维度的媒介景观和奇观理论研究武术网络媒介形象,有利于揭示武术形象生成的多元机制。

另一方面,“Mediated”定义了“‘形象’乃是通过‘媒介’而存在的”,意味着“媒介形象成为巨大的社会欲望的变压器,调节着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单一社会细胞到广大社会实体的认知与情感关系。它将社会欲望表征为社会幻想”,由此,“各种媒介机构和节目生产组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来组织吸引大众的欲望的叙事”,广泛塑造的媒介形象“意味着对于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掌控”^⑥。媒介成为“第二心灵”,俨如人们思想、感知和意志的决策机构,诉诸“浪潮效应”导致“意识外泄”,个人丧失主动权^⑦。对武术符号的文化消费加剧“委琐”效应,损伤武术媒介形象。媒介操控情感生成,娱乐、宣泄成为主流,正如尼尔·波斯曼所指出的,“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所有的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媒介娱乐成为超级意识形态^⑧。正是借助网络对“马保国事件”的喜剧性传播,大众被引导至消费武术符号快感的“狂欢”中,恰如巴赫金指出的,狂欢产生在脱离现实、颠覆秩序的符号“乌托邦”中。

哈布瓦赫极大地推动了记忆研究,“将个体记忆放大至社会群体层面进行考察,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

①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3页。

②王朋进:《“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③吴予敏:《论媒介形象及其生产特征》,《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1期。

④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⑥吴予敏:《论媒介形象及其生产特征》,《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1期。

⑦德里克·德克霍夫:《文化的肌肤》,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21页。

⑧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过程和结果”^①,记忆被纳入整体视野,衍生出文化、社会和历史记忆,它们内在交织,“难以隔离与具体的区分”^②。集体记忆“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③。正是与象征符号的关联,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④。不仅符号承载记忆,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⑤。集体记忆与媒介生产循环往复,“社会记忆在某种情况下并非来自生活经验,而是来自大众图像的制造”^⑥。总之,在符号承载、媒介支撑、社会建构和图像来源等方面,记忆和形象紧密关联,媒介符号生成形象和记忆,形象是短时评价,记忆是对形象的长时存储,已有记忆影响当下形象生成,媒介形象影响记忆固化。“马保国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列事件积累过程中的截面,已有的媒介形象和记忆在这个截面上绞合生成新的媒介形象,利用记忆理论有助于揭示武术形象崩解的深层逻辑。

上述梳理以媒介、符号及其建构性为基点,初步搭建了分析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理论框架:以媒介形象理论为核心,以景观和奇观理论为补充,揭示其内在机制;使用消费主义和狂欢理论,勾勒其动力系统;运用记忆理论,阐明其纵深表现。

二 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表现

马克斯·韦伯认为,“祛魅”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表达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诠释的解体,对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崇高性、魅惑力的消解,理性跃升为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和核心价值。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是武术形象“祛魅”的结果,消解神秘,解构高超,降格矮化,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混沌现实中,理性和非理性并肩繁荣发展”,高度发达的媒介是“信息、知识、启蒙和理性传播者的来

源,也是幻想和情感体验的来源”^⑦。故此,武术形象“祛魅”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体,夹杂愤怒、谩骂、娱乐等复杂情绪,经由形态各异的亵渎、冒犯和嘲讽,其正面形象走向崩解。

(一) 荒诞式的话语呈现

一是自我话语与围观话语的喜剧性冲突。通过在媒介上宣称武术功用的自我标榜、应对网民质疑的自我辩白、对热门武术人物的蹭热度点评,马保国将自己塑造为“武术高人”,言谈举止间不断强调自身的“强大”。马克斯·韦伯将人类行为划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习惯性、情感性等四类。对马保国而言,武术的“获利工具”属性最明显,其话语和行为蕴含强烈的获利意图,展露的广告式话语浮夸俗气,视频中武术动作缺少章法,比武落败事件引发他以往的视频和言行事迹大范围地迅速传播,自我打造的话语与网民话语发生严重冲突。针对马保国欺骗性强的言行表演、自我标榜的商业谋利,作为围观者的网民,其主要话语方式是调侃和谩骂。例如,网友“桥坛漫步”调侃道,“……马大师先后用了接、化、发三种绝世神功,同时手掌的太极总开关也顺势打开,倒地的身姿立马变得高大上了!”网友“田+”跟帖,“骗子老了还继续骗,挨打是迟早的”。网友“二农戏猪”指出,“他更多的是一个骗子!……我拒绝同情这个无耻的老骗子!”通过滑稽式的调侃谩骂、嘲讽式的鼓励反语,网民强力抵制马保国的自我表演话语,完成对“马保国事件”的戏剧化改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武术的正面形象。

二是赛前与赛后自我话语的戏剧性反差。利益驱使马保国赛前与赛后话语剧烈的戏剧化转向。赛前的自我话语主要是微博的间接鼓吹和主动炒作,前者包括转发赛事主办方和其他自媒体微博,极力渲染“太极大师马保国师徒威力太大?5月17日竟然难逢对手,苦于寻觅”。后者则如,5月14日、16日微博@他人,进行社会动员,号召观众参与,开展自我吹捧,号称“搭手分输赢”,马保国的自信展露无遗。赛后的自我话语则传递出

①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②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③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④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⑤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⑥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4页。

“落荒而逃”的喜剧感,博文从“自我吹捧”转为“报平安”,“马老先生现在一切安好,谢谢大家挂念”。尤其是“马老先生已经平安从山东淄博返回上海”的博文,与赛前入场高举横幅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表演味道浓烈。赛前马保国言之凿凿地提醒裁判,自己的习惯性动作容易误伤他们,但比赛30秒即被击倒并昏迷,二者反差巨大。从自我炒作到昏迷,再到报平安,整个事件的故事性要素非常完备。事后三个月,马保国出席武馆活动,一如往常神色,口若悬河,甚至参演电影,似乎“30秒KO”事件不曾发生,武术传承与商业谋利内在交织,但“他们的这些不当获益,是以碰瓷、玷污传统武术文化为代价的……不明就里者很可能被其诓骗,对武术文化产生歪曲性理解”^①。

三是神态动作等副语言与语言的矛盾性对抗。就传播本质而言,马保国的武术动作和表情神态均是副语言符号。“副语言作为辅助的交际系统与语言在交际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唇齿相依、互为共存”,然而,“人类使用的语言比副语言真实性差,有时甚至是谎言,而说话人的副语言往往能够暴露其虚伪”^②,在“闪电五连鞭”“缩猴脖”“鹰捉功”等视频中,马保国动作滑稽,虽然连贯,但节奏感不强,力量感不突出。马保国展示的“武术”,看上去动作缓慢无力,幅度小,四肢在周身游动,被网民调侃为“舞术”,有网友指出,“看马先生的举止动作,就不像一个会武功的人!”然而,他的表情认真严肃,嘴中念念有词,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讲解“祖传刀法”时,强调“陕西祖传的杀敌刀法的核心”是融入了太极刀法、武学大师尚济的形意刀法,“刀刀都用接化发”,“以技的变化为核心,刚柔相济,实用”。马保国从来源、招式、作用等方面,详细阐释各种武术动作,均是如此。经由真实的副语言解构,马保国的虚幻语言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洞文本。肢体动作“文本”与语言文本之间的巨大张力,赋予欺骗性认知以似真似幻的独特效果。语言神态与举止动作的落差,使马保国的气定神闲具备小丑潜质,成为网民笑料,但也拖累武术使之沦为笑柄。

(二)断裂化的媒介记忆

一是作为媒介记忆的武术人物符号崩解。媒介记忆影响媒介形象的生成,借助媒介存储、人体记忆功能,“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③。武术人物是武术媒介记忆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直接进入其符号表征和叙事框架中。马保国等人的负面武术网络事件引发巨大质疑,消解传统武术的“媒介明星”形象。其一,历史武术人物形象的消解。霍元甲、叶问、陈真等近代武术“明星”被塑造为反抗侵略和挑战强权的象征符号,作为民间故事、影视戏剧、小说游戏的主角,经由反复出现而不断激活媒介记忆。基于雷雷、马保国等人物的负面事件被大肆传播,人们由非议武术直接转为质疑历史武术人物。例如,网友“这些年...”指出,“李小龙、叶问也是吹出来的,你以为真能打”,“李小龙放在打不过一个省级散打运动员,你信吗”,武术虚无主义色彩明显。其二,当代武术传承者形象的崩塌。太极是最具标志性的中华传统武术门类,陈小旺、王占军、王占海等人传承的陈家沟太极,经常出现在武术的专业媒介和大众报道中,但陈家沟太极被部分网友认定为“五十步笑百步”。质疑历史和当代武术人物,消解武术传承主体,武术成为无根之萍,其正面形象的根基被直接破坏。

二是作为历史记忆的武术技击认知弱化。历史记忆关系媒介形象的颠覆。哈布瓦赫将“历史记忆”界定为,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部分集体记忆以社会认同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以诠释社会认同与区分”^④。不同于媒介记忆,历史记忆更加基础、碎片化,更强调时间轴的发展变化,逻辑更严密,二者在目的、价值观、表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⑤。史书和武术典籍的记载,历史影视和小说的再现演绎,构建了武术技击性的历史记忆。然而,现在的武术技击的历史记忆面临崩解,几近坍塌。其一,武术技击神话的破灭。“技击是武术文化价值的本源”,“以‘打’为表征的技击属性”是武术基因的核心要素^⑥。历史记

①中国青年报(大风号):《马保国被KO后,“重出江湖”:碰瓷武术怎么就成生意》, <https://news.ifeng.com/c/7z5GBz5G0fY>。

②田华,宋秀莲:《副语言交际概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③邵鹏:《媒介记忆理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④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⑤邵鹏:《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浙江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方崑,朱邱哈:《“打”是衡量传统武术文化价值的标准?——基于武术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律背反的理性思考》,《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4期。

忆中武术无视年龄和数量差距的超强技击效果,与如今武术大师们的瞬间落败,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反差巨大。网民纷纷质疑武术的技击性,例如,有网友跟帖,“中国武术本就是强身健体唯一一用,跟实战打斗不是一回事,就是彻彻底底的‘花架子’”,武术丧失技巧性,势必跌落神坛。其二,传统武术的表演化和体操化。“以体操为设计蓝本,融合武术套路、技巧、舞蹈、戏曲等众多形体类运动形式……成为武术的核心”,对外部美感、程式化的追逐,映射武术的衰退之势^①。过于满足观演需求、太注重程式化展开,严重损伤传统武术的形象。

三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武术价值认知坍塌。文化记忆影响媒介形象的传播与固化。文化记忆是“以媒介符号为基础的记忆”,关注记忆符号的文化意义;媒介记忆是“以媒介载体为基础的记忆”,关注存储行为的功能发挥^②。相较于浅层性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经过观念认同和情感内化,深植于文化传统,并逐步上升为价值理念。旧时武术为全民所熟知、被广泛研习和应用,其价值被普遍认可,恰如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是一个群体所有成员共有”^③的界定。作为文化记忆的武术价值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媒介中的传统武术口碑下降。近代武术是“强国保种”话语的实践载体,饱含国家希望和民族精神,成为强大的救亡工具^④。在马保国等负面武术媒介事件中,武术完全脱离国家符号和民族象征体系,沦为所谓的“骗子”工具和网民“吐槽”对象,例如,网友“隔世阑珊”评论道,“只要观察下公安专科毕业生们上岗以后会不会用传武套路或者散打去抓犯罪分子就行了。传武但凡有点用……”,他认为武术愈加不靠谱。其二,圈层化发展撕裂武术价值。从“马保国事件”看,武术有多个圈子:职业圈抨击马保国,强调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业

余圈强调武术的健身作用;观众圈重视武术的艺术性和技击性,认为武术和马保国都是“笑”话,娱人之乐。总之,往昔正面武术媒介形象关联的文化记忆被撕裂。

(三) 消遣式的网民参与

一是狂欢式消费武术符号。狂欢理论是巴赫金影响最大的创见,狂欢颠覆严肃、秩序的“第一世界”,是打破限制的“暂时的乌托邦”。在“马保国事件”中,网民通过亵渎、嘲弄、戏谑、贬低、歪曲、模仿等各种手段,消费武术符号和消遣“大师”形象,享受虚拟狂欢,纾解疫情阴云下的压抑和积郁,直抵“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网络世界关于马保国及武术的话题沸反盈天,传播的娱乐化特征明显,马保国和武术都成为嘲笑戏谑的对象,是满足网民愉悦的符号资源。集体传播加剧形象刻板化进程,服务于大规模的文本生产和信息流通,马保国成为共识性的刻板符号,作为新一轮的文本再生资源,“马保国式……”用于修饰人物和角色的虚假夸张、无能乏力。在对马保国和武术符号的消遣过程中,武术被重构和消解为“骗术”“舞术”和“表演”。人们利用“马保国事件”中的符号元素,积极参与集体狂欢,然而“符号使用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削弱”^⑤,大师、太极拳、咏春、武术等“故事的符号变成委琐(Trivialization)的东西,衰弱就必然是这个委琐化过程如影随形的命运”,“为一个委琐的目的服务时,这些符号的意义就丧失殆尽了”^⑥。武术成为马保国沽名钓誉、获取名利的欺骗性工具,作为网民娱乐和消遣的符号对象,两次委琐化使武术的正面媒介形象轰然崩解。

二是情绪化参与事件表达。在社会化媒体中,信息沟通更加情绪化^⑦,语言咒骂、人格侮辱等激烈程度远超现实语境^⑧。在马保国网络事件

①马廉祯:《论中国武术的现代转型与竞技武术的得失》,《体育学刊》2012年第3期。

②邵鹏:《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浙江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

④刘宏亮,顾文清,王璇,等:《中国传统武术话语权危机与提升策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2期。

⑤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

⑥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189页。

⑦Ho S M, Hancock J T. “Computer-Mediated Deception: Strategies Revealed by Language-Action Cues in Spontaneou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 33 (2) :393-420.

⑧Derks D, Fischer A H, Bos A E R. “The Role of Emo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 24 (3) :766-785.

中,用户更倾向于表达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①。网民的情绪化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以辱骂为代表的愤怒,攻击马保国博取眼球和商业谋利。服膺情绪感染、见解迁徙、注意强化以及“沉默的螺旋”等机制^②,网民怒喷马保国玷污传统武术,损害武术形象。愤怒是情感盲目性和道德合理性的综合体^③,网民的辱骂和愤怒既表达不满,亦捍卫中华传统武术形象,解构主流媒介和“大师”自己塑造的武术形象。其二,以集体吐槽为代表的娱乐,嘲笑马保国的可笑言行,讽刺武术不堪一击,表达不满。幽默风趣的吐槽抒发不满,抵抗性明显,如同一场神圣仪式,包含对权威、权力的抵抗,宣泄狂欢情绪,争夺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④。碎片化、狂欢化的娱乐话语取代宏大、严肃的理性话语,知识精英、主流媒体、官方机构丧失话语权^⑤,其建构的武术媒介形象被网民消解。经由情绪化的参与表达,解构武术曾经建构的严肃形象,传统武术沦为商业符号“玩具”。

三是嘲讽式的文本再生产。借助独特的文本生产,网民进一步消解武术形象。约翰·费斯克依据巴特的“作者式文本”概念,提出“大众的作者式文本”,即生产性文本。“马保国事件”中的符号是典型的生产性文本,既不是蕴含权力与规训的“读者式文本”,也非遵循一定限制的“作者式文本”,缺少规制,难以控制自我,成为大众再生产的对象,“社会体验并不受文本控制,它决定了文本与社会关系的结合,并且驱动大众的生产力”^⑥。网民们自由发挥媒介的娱乐功能,通过文本再生产,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愉悦感^⑦。娱乐消遣是网民参与此类事件的直接动力。戏称马保国为“马大尸”,将“接化发”解读为“接单、火化、发表”,讥笑其在比武中迅速倒地。对“马保国事件”符号进行新元素的拼接,例如,为其武功演示视频配上黄龄的《痒》,黄龄是声音极其柔媚的女歌手,《痒》澄澈空灵,极具女性气质,二者搭配喻指马保国的武术就是“舞术”,没有攻击性。给马

保国的五连鞭视频配上雷电特效,夸大武术的“威力”,反讽其为好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绘制马保国的表情包,实现黑化、丑化、矮化效果。“不讲武德”“耗子尾汁”成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等等。对马保国事件的符号利用和文本再生产,将武术建构为区别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符号象征的其他事物,切断其与过去正面形象的有机联系,讥讽武术的病态式发展,完成对武术正面形象的解构。

三 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原因

媒介是武术传播和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媒介融合是影响传统武术形象塑造的重要因素。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的崩解,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 基于视觉媒介的武术欣赏结构变化

武术在明清两代走向成熟和鼎盛,其繁荣和发展与当时抗倭战争、镖师行业有关^⑧。在义和团等清末的民族抵抗运动中,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⑨。彼时,主要依据实用价值衡量武术,看重其技击性。现代武术的评判标准发生巨变,柔美优雅含蓄的姿态动作、快慢结合的节奏感跃升为主要指标,身体叙事从力量和速度转为含蓄和文雅,传统武术由身体向文化形态转变,儒家文化熏陶下“点到为止”的武德被大力阐发。而此时西方搏击体育在全世界流行,二者的对比无法避免,武术被带入体育逻辑和技击话语系统中。搏击激烈直白的身体力量展现、胜负二元对立的欣赏模式,更适合网络传播和视觉观赏,剧烈冲击传统武术的当代套路表演和自忖高深。受西方搏击的强力激发,武术的底层技击逻辑被唤醒,大众武术审美复归。这种审美变化与屏幕时代的视觉文化密不可分,作为视觉欣赏对象的武术,缺乏激烈搏击的力量冲击和肉体争斗,缺少二元对立的胜者歌颂,也无败者供人鄙夷。作为文化符号的传统武术,其实用价值不断消减,在以胜败为名的搏击面前,

①Yardi S, Boyd D. “Dynamic Debates: 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010, 30 (5): 316-327.

②窦东徽,罗明明,刘肖岑:《网络喷子:演变过程、产生机制及干预路径》,《现代传播》2017年第10期。

③陶涛:《论“愤怒”的道德地位》,《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④王芳,吴君:《仪式的抵抗:网络“吐槽文化”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5年第5期。

⑤张卓:《众声聒噪:网络空间话语失范与秩序建构》,《人民论坛》2019年第31期。

⑥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⑦蒋明敏:《情感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⑧刘宏亮,顾文清,王璇,等:《中国传统武术话语权危机与提升策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2期。

⑨宗雪飞:《中国武术近代史与国际化发展趋势》,《武术科学》2005年第2期。

难免一败涂地。“马保国事件”似乎进一步印证,即便是“武林高手”,也不堪一击,中国功夫的气、武德和举重若轻的气势难以体现,大众的武术神话被无情破灭。

(二) 媒介奇观效应下的围观扩散

从武术打假到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的论争,肇始于早期闫芳、王林,“马保国事件”是话语逻辑的转折点。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此类比斗带有鲜明的“媒介奇观”属性。媒介奇观是“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①。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进路中,凯尔纳发展居伊·德波的“景观”概念,提出媒介奇观理论,强调媒介事件的冲击力、诱惑力和传播力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因当代媒体自身的膨胀、跨越式发展,而导致令人瞠目结舌的各种结果,统称为‘媒介奇观’”^②。借用中华传统武术的符号体系,“马保国事件”成为众人参与构建的媒介奇观,引发大规模的围观扩散。追逐商业利益推动该媒介事件的策划和发展,演武堂及其系列赛事成功地被“广而告之”,马保国成为自带流量的网络“红人”,三个月后受邀“复出”参加某武馆的开业活动,声名赫赫。比武在中华武术和自由搏击的跨类竞争中展开,所具备的冲突性和趣味性使事件更具奇观效应。同时,商业自媒体为争夺流量、蹭取热度,进一步推动“马保国事件”传播。在媒介奇观的围观扩散过程中,传统武术沦为消遣玩物和商业工具,“大师”与武术画上等号,成为唾弃对象,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

(三) 权威话语缺席下的情感消费

在“马保国事件”中,媒介社会心理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人类是否已步入“后真相时代”还存在争议,但“后真相”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少见,“情感性表达、情感化解读、情感式传播,成为新媒体社交网络中的常态及推动人们进行互动交往的重要方式”^③。媒介消费方式从传统时代的深度内容消费,转变为娱乐化、浅薄化、碎片化的情绪消费。

在“马保国事件”中,网民并不细究武术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等知识性内容,重在用键盘发泄情绪,武术本貌和事实真相并非关键。权威话语的缺席进一步加剧武术形象的情绪化消费,半官方性质的中国武术协会以及主流纸媒并未专门评论和集中引导^④。在整个事件中,尽管有武当道长、青城掌门和李连杰恩师等知名人士质疑马保国,捍卫武术尊严,但说服力仍然不够,与受众的情感消费难以匹配,无法同频共振。相比权威话语的寂寥无声,民间网络话语喧哗热闹,由此提供的信息温床,“在新媒体数字技术的裹挟下极易发生负性转向,其连接和维系群体团结的情感能量也会转化为情感动员的负性能量”,“网络互动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度自由的情感表达场域,在匿名化、缺场化的网络社交媒体中”,以非理性的网络宣泄方式表达情感成为常态^⑤。通过对“马保国事件”的娱乐化情感消费和话语权让渡,武术变化为大众随意定义的对象物,武术符号委琐化。在一片嘲笑声中,传统武术高大上的媒介形象崩解。

四 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的评价

如何正确评价传统武术网络形象的崩解现象,关系到武术形象重构及其传播的顶层设计,规定着媒介传播的战略重点和具体执行。

(一) 媒介导致武术形象的多维崩解

媒介化理论认为,媒介已不再是经济、政治、文化机构的控制性工具,日益成为半独立性的机构,为获取资源,媒介更加遵从自身的受众逻辑和市场指引,而其他机构尊重并向媒介逻辑靠拢^⑥。当代武术是媒介化的典型存在物,由于权威话语的缺席,“马保国事件”陷入媒介的市场逻辑,传统武术形象在多个维度崩解。一是网络环境机制导致碎片化崩解。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断裂,对网络话语缺少引导,网民们打破传统武术神话,创作满足娱乐需求的快餐式消费内容。基于网络资讯平台和社交媒体渠道的丰富性,形象崩解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这是一个逐渐累积、集聚交

①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刘中望:《媒介奇观与“雷”文化——后超女时代湖南电视现象的文化阐释》,《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③吴翠丽:《“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中情感的负性转向及其防控策略》,《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0期。

④常媛媛,曾庆香:《新型主流媒体新闻的身份建构:角色展演与道德规训》,《新闻界》2020年第2期。

⑤吴翠丽:《“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中情感的负性转向及其防控策略》,《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0期。

⑥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9页。

织的过程,碎片化散布于系列负面武术网络事件中。二是网络内容生产特性导致全面崩解。网络内容生产主体日益多元化,众多用户和自媒体广泛参与,其集体狂欢导致传统武术形象的崩解,同质化的调侃和戏谑式的娱乐,彼此参照,相互印证,无奈接受传统武术已然衰败的媒介现实,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意见。在“马保国事件”中,娱乐性内容的长期再生产和传播,影响广泛。三是互联网的广泛分发产生遍在效果。马保国等人的类似事件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使传统武术的正面媒介形象整体崩解。即便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符号象征的武术,一旦缺少文化示范和政治规制对媒介逻辑的引导,将完全陷入以迎合受众和经济逐利为主要目标的媒介逻辑控制。

(二) 集体参与加速武术形象的崩解

受众集体参与是互联网媒介生态的最大特点。网民参与负面武术媒介事件主要包括“网络围观”和“媒介考古”两种方式。“网络围观”指网民借助各种媒介工具,以大规模群集、浏览、点击、转发、评论等方式,关注社会热点和网络事件,既包括静观事态、只关注不行动,也包括积极参与、关注并评论表态^①。前者不主动参与“马保国事件”,仅关注事件相关的娱乐性内容,满足放松需求,但通过浏览点击提高事件热度,借助算法和热搜间接扩大事件影响,用流量吸引并激励行动者参与文本再生产。后者对“马保国事件”及武术进行多维解读,围绕“马保国事件”生产娱乐性文本,使事件进一步娱乐化,获取观察者流量。上述二者相互交织,导致事件更加娱乐化、戏剧化,进一步损害传统武术的媒介形象。“媒介考古”指借助网络强大的信息存储能力,推动行为主体打破时空限制,将与热点事件关联的旧有痕迹重新聚集、提炼传播。从这种意义上说,“马保国事件”成为重要的信息触发点,事件人物和武术相关文本被重新发掘,例如,马保国往昔的言论、视频、微博等,以及闫芳、雷雷等人的相关事件,甚至数十年前的事件与国外的类似事件。“人们对信息的渴求会激发对历史时间点上的信息检索,成为一种追溯历史的考古学。……曾经的潜在的行

动痕迹就会在互联网空间中重新涌现,并且迅速传播。”^②“媒介考古”开掘往昔文本的佐证功能,在时空双重维度扩大事件影响力。“网络围观”和“媒介考古”直接加剧传统武术形象的崩坏程度和消解速度。

(三) 武术符号形象与现实发展的脱节

媒介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可远溯至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突出媒介建构现实而非机械反映,鲍德里亚强调符号和媒介是独立于物质基础之外的造物,认为“除了巨大的影像之外,上帝什么也不是”^③。在“马保国事件”中,武术在当代媒介技术和现代文化逻辑的辅翼下,成为超现实的“拟像”、与真实无关的“仿真”,网络中的武术形象脱离现实,宛若不相干的同名事物。武术作为中华文明符号和“中国形象代表三个符号之一”^④的辉煌身份被暂时遗忘,正因为如此,质疑和戏谑武术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必顾虑武术形象的崩解。同时,作为媒介事件的武术被集体消遣和大众娱乐,这种交互影响“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⑤,在这一媒介过程中,武术完成逻辑自洽,切断与现实的联系。商业自媒体和大众的彼此模仿,对武术进行戏谑式的再生产,事件相关人士依据媒介内容进行信息生产,与现实发展脱节,以讹传讹,流毒至深。在超真实、内爆的媒介环境中,武术负面媒介形象直接影响现实中人们对武术的认知,丧失技击性的传统武术,离优秀文化渐行渐远。

五 传统武术网络媒介正面形象的复魅

传统武术网络形象崩解负面效应明显,从“祛魅”走向“复魅”,重塑正面形象,亟需提上日程。武术形象“复魅”应坚持政府主导,综合发挥专业人士、媒介组织和意见领袖的中坚作用,加强武术教育。

一是发挥媒介作用,搭建新的武术认同基础。公众认同是塑造传统武术网络媒介正面形象的前

①靖鸣,蔡文玲:《从全景敞视监视到全民网络围观:动因及其特征》,《当代传播》2019年第2期。

②陈胤:《时间、痕迹与网络的考古学——对抗信息遗忘的互联网记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

③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④《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20531.html。

⑤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提,必须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方面,打造全民武术媒体,提升传统武术官方肯定与民间认可的协同度。对传统武术与自由搏击之争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论证、科学说明、积极发声,并推动武术活动“出圈”。当下武术媒体的影响多局限于圈内爱好者,应尽快打造知名度高的全民武术媒体。发挥官方观点、专业话语对民间声音的回应和引导功能,多维塑造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普及武术知识,统辖武术现实与行业宣传两大场域。提升武术信息传播水平,强化大众教育。发挥武侠影视剧的独特作用,优化视觉期待。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作战,向大众呈现武术的真实面貌,破除虚幻想象,在武术现实和符号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科学塑造合理的武术媒介形象。

二是加强管理,推动武术形象正常化发展。从王林到马保国,武术被妖魔化,沦为金钱工具,成为荒诞故事的主角。在网络时代,武术与已有媒介记忆发生断裂,加剧媒介形象崩解,其正常化、正面化发展势在必行。一方面,停止闹剧,反对肆意消费,避免武术沦为“荒诞剧”。2020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马保国闹剧,该立刻收场了》,呼吁叫停B站、微博等平台戏谑、讥讽和消遣武术的内容,避免武术媒介形象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加强民间武术管理,打击歪风邪气,避免其沦为获利工具。2021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协联合推出《清理整治武术乱

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明确十类严厉打击的乱象,包括不规范赛事、自创门派、自封称号、收费敛财、虚假宣传等,直指“马保国事件”反映的诸多问题。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和细化相关政策的制定落实,切实提升武术的媒介形象。

三是健体铸魂,多维强化武术教育。武术网络形象的崩解,既与武术在现代社会的没落有关,也因为大众不了解易被“噱头”吸引。2021年2月教育部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高中历史课介绍传统武术理论体系,使学生了解武术的功理功法和武德,弥补基础教育阶段武术知识教育的空白。一方面,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并举,拓宽武术教育渠道。采用课堂授课、学术讲座、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年轻人多维了解和正确认识武术。根据各教育阶段的特点,采用体育课、课间操、武术课等形式,推动武术在更多青年人群中的实践练习。另一方面,专业培养与艺术展现并重,营造武术教育氛围。武术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对现代人的精力、耐力是巨大考验。除基础性的全民教育外,相关部门还应加大武术专业人才的选拔力度,做强专业武校,纯洁职业武术圈。深度对接文化创意产业,注重发挥武术的文艺表演功能。新时代武术应聚焦修心健身,强化媒介引导,彰显其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和独特价值,实现其媒介形象的塑造和继承、发展的良性循环。

“Disenchantment” and “Enchantment”: 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Network Media Image

LIU Zhong-wang & LI Long-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Ma Baoguo Incident” dispelled the image of Wushu in network media, manifested as absurd discourse presentation, fragmented media memory, and recre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netizens.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change of Wushu appreci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visual media, the proliferation of onlookers under the media spectacle effect, and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emotional consumption in absence.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shu and the Internet, the media leads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dissolution of Wushu image,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accelerat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Wushu image, and the symbolic image of Wushu is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To prevent the disintegration of Wushu’s online image and reshape its positive imag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media to build a foundation for Wushu’s identity, promote the normalized development of Wushu’s image, and strengthen Wushu educ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Key words: Wushu; network media image; disenchantment; Ma Baoguo incident

(责任校对 龙四清)